

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及其困境

黄小洲

摘要 狄尔泰发展出一种历史解释学。历史理性批判是一种对人类认识自己、认识其创造的社会和历史的能力的批判。生命在狄尔泰整个哲学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而民族国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体。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就从早年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生命体验延伸到对客观精神广阔世界的普遍理解。如果说在客观精神中狄尔泰靠近了黑格尔,那么当他涉及历史规律、价值或目的的解释时,他就马上表现出拒斥黑格尔、拒斥启蒙历史哲学的态度,而重新走上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路径。狄尔泰身上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与启蒙主义—实证主义产生了深刻而尖锐的对立,从而使他深陷无法调解的困境。

关键词 狄尔泰;历史理性;解释学;客观精神

中图分类号 B51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4-004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XZX012)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有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把这视为自己哲学的使命。然而,如何认识你自己?狄尔泰的回答十分明确:人通过理解历史来认识自身。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狄尔泰发展出一种历史解释学。在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中,有三位核心人物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兰克、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显然,狄尔泰想要把这三者互相矛盾的思想综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折中调和的立场势必给他的历史解释学埋下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说:“人类乃是历史的存在物。”^[1](P264)反之,自然虽有时间变化,但是无历史;历史标明了人类存在的尊严与有限性,因为历史是人的创造物。在西方,如果说18世纪被称为启蒙的时代,那么19世纪就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的人们基本上都会带着一种历史感来审视一切,这在精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几乎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黑格尔“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著名主张就是绝好的例证。甚至在自然科学当中,对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也逐渐赢得了大众的关切。狄尔泰在柏林大学当了几十年的哲学教授,他对历史问题的深刻思考赢得了同时代人的赞誉和尊敬,人们甚至把狄尔泰视为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是德国历史学传统的杰出继承人。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解释学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历史解释学,因为它浸润着深厚的历史主义养料。

然而,把历史视为哲学的必备要素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事情。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应该关注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历史恰是流变不居的,“历史就是毁灭史”^[2](P31),因此古希腊人是反历史的,古希腊没有产生历史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富代表性,他的著名论断是:“诗比历史更真实。”这种反历史的态度在意大利的维柯那里得到了一次有力的扭转。维柯从诗性智慧出发,他的《新科学》(1725年)是西方历史哲学的首次伟大尝试。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在《风俗论》(1756年)中第一次发明了

“历史哲学”这个名称,因此,我们通常把伏尔泰视为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之父。虽然赫尔德把伏尔泰的历史哲学传播到了德意志,然而,他的思考方向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启蒙主义转变为浪漫主义,这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出场准备了基本的思想前提。

探讨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必须要了解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因为它是狄尔泰历史思想的直接源头。德国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由兰克、德罗伊森、西贝尔、特赖奇克和迈内克等人组成,他们的活动贯穿整个19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后。这一学派的基本立场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态度来对抗启蒙哲学。兰克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作为兰克的学生,狄尔泰曾赞美说:“19世纪所有的力量因兰克而焕发出无限生机。”^[3](P3)在某种程度上,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可以视为兰克历史思想的哲学化表达。伽达默尔就明确指出:“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提供一个哲学基础的努力,就是试图从兰克和德罗伊森为反对德国唯心论而主张的东西推导出认识论上的结论。”^[4](P223)这样一来,浪漫主义式的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式的启蒙主义的矛盾对立就成了狄尔泰思想中的底色,其尖锐程度深深折磨着狄尔泰。

启蒙主义赞美理性和科学,历史主义则迷恋情感与本能;启蒙主义主张普遍性,书写世界历史,而历史主义强调特殊性,沉浸民族历史;启蒙主义宣扬民主自由等普遍的自然法、人道价值和天赋人权,历史主义则崇拜原始蛮力的英雄人物、强权政治和民族至上;启蒙主义说要有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标准,并以此衡量一切历史发展,世界历史有规律可言,其总体上是进步的,历史主义则相信只有个性才是真实的,认识历史需要的是忘我的投入和同情理解,历史上的一切时代都是相对的,现代并不比古代好;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乐观向上,期待未来,历史主义则怀古伤感,时而忧郁时而亢奋。

历史主义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狄尔泰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因为如果把历史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势必走向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则是真理的天敌。德罗伊森指出:“历史的运转,质言之,就是永无休止的批判过程。”^[5](P49)狄尔泰从来不想走向相对主义,他把自己毕生的学术事业称为“历史理性批判”。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命名。初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康德式的名称。人们会以为,狄尔泰打算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之外,补充进来一个第三批判(历史理性批判)。其实不然。狄尔泰认为,如果没有历史,整个理性批判的事业是缺乏根基的。这样,狄尔泰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历史主义批判的对立面——黑格尔。

黑格尔在一切方面都强调理性的必要性,在历史领域中尤其如此。他主张:“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6](P20)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在现代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狄尔泰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正是借用黑格尔的思想,狄尔泰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偏见。国际狄尔泰研究专家马克瑞尔指出:“狄尔泰用历史理解和历史判断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历史理性概念。”^[7](P19)这个限定非常准确,这意味着狄尔泰拒斥黑格尔那主宰型的历史理性,认为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概念理性、辩证理性或思辨理性)是一种没落的形而上学残余。用历史理解或历史认识来重新界定历史理性,是狄尔泰对黑格尔思想的改造。这意味着解释学成为狄尔泰工作的重要方法论依据。

狄尔泰自述说:“我对于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的研究就产生于前述科学背景之下……我的工作乃是1883年的《精神科学导论》(第1卷)的继续。那部著作的出发点是历史理性批判这一任务。它紧密联系着由历史学派组织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精神科学,并且努力探寻它们的认识论基础;同时,它也以某种方式竭力抵制当时甚嚣尘上的认识论知性主义。”^[1](P105)

换言之,狄尔泰所谓的历史理性批判与其早年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毋宁说它们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历史理性批判是“一种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他所造成的社会和历史的能力的批判”^[8](P191)。历史理性批判这一工作的总目标是要通过对文学、艺术、道德、法律、宗教、哲学等具体的精神科学的考察,找到稳固的认识论基础之后才能完成。因为精神科学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历史。所以,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也可以称为精神科学的解释学,只不过这种认识论奠基工作,狄

尔泰早年依赖的是心理学的方法,晚年则侧重在解释学的方法上。

兰克教导说:“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集事实,然后编排所收集的事实以便理解这些事实。……历史首先是依靠批判的理解,把真相与谬误区别开来。”^[3](P147)显然,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狄尔泰。在狄尔泰这里,由施莱尔马赫发展出来的西方现代解释学与历史主义合流了。何卫平在为李永刚《历史主义与解释学》一书写的前言中就说:“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与历史主义的融合。”^[9](P1)狄尔泰就是这种融合的关键点。历史通常被认为是对过去的人和事的一种记忆,历史与时间有一种深刻的关联。韩震把狄尔泰历史解释学的基本命题正确地概括为:历史是生命的同情式理解^[10](P9)。

二、历史与理解生命

生命是狄尔泰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人的意识、人的心理、人的灵魂。如何认识生命?生命存在于人当下的内在体验中。所有这些都使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带上了浓厚的生命哲学底蕴和德国浪漫主义色调,他的解释学也可以被称为一种生命解释学。施莱尔马赫和谢林分别是德国浪漫主义在宗教和哲学上的代表,狄尔泰正是施莱尔马赫最杰出的研究者和传记作家。1864年,狄尔泰博士毕业,论文主题正是施莱尔马赫的伦理学,1870年他出版了《施莱尔马赫传》第1卷。1900年,狄尔泰在《解释学的起源》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赞美施莱尔马赫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解释学的创始人。狄尔泰说:“一种富有成效的解释学只能产生于这样一个把语文学解释的技巧与真正的哲学能力相结合的头脑中。施莱尔马赫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头脑的人。”^[11](P86)

我们知道,从康德、费希特到谢林、黑格尔,唯心主义在德国哲学的舞台上占有强大的主导地位。施莱尔马赫通常以宗教神学家的身份被后世所铭记。面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和康德、费希特式的启蒙理性宗教观,作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主张宗教要回归直观与情感,对上帝要有一种绝对的依赖。1799年,他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了《论宗教——对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讲话》一书,其中说:“对宇宙的直观,我请你们熟悉这个概念,它是我整个讲演的关键,它是宗教最普遍和最高的公式,你们可以在我讲演的每个地方发现这个概念,宗教的本质和界限可以据此得到最准确的规定。”^[12](P33)

直观是什么?在通常的意义上,直观是直接的感觉,因而它是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不是抽象的理智思维。此外,这种直观还要有一种对上帝(绝对者)的依赖情感才能有合理的来源和正当的力量。施莱尔马赫用了很多比喻来描绘对上帝进入个别的直观和情感之后那种甜蜜幸福的神圣状态。“它娇羞和温柔得就像少女的第一次接吻,它圣洁和丰腴得就像新娘的拥抱。……最细微的震动,神圣拥抱的轻轻松开和直接对视……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情感扩散到全身,如同羞涩而快乐的红晕映现在她的面颊上。这一刻就是宗教的最高花朵。”^[12](P43)

狄尔泰接受了施莱尔马赫浪漫主义的直观情感论,但做出了重大的改造。他去除了施莱尔马赫直观情感论的宗教根基,把它转变为一种较为历史化、经验化、客观化的具体解释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生命体验与理解(理解可以被视为一种再体验)。什么是体验?体验就是在时间的序列中,把过去统摄进现在,从而构成现在的一个意义统一体。狄尔泰旗帜鲜明地主张:“体验是历史世界的细胞。”^[11](P142)在体验当中,它不仅包含思维的基本运作,而且包含客体体认、价值判断和目的追求。就此而言,生命独特单元的体验也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科学的历史学是可能的。因此,潘德荣先生把狄尔泰的哲学标识为“体验诠释学”^[13](P270)。

19世纪同样可以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世纪,狄尔泰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的观念处处渗透着科学实证主义的气息。他说:“精神科学的目的在于获得有关其对象的客观的知性认知。”^[11](P283)像施莱尔马赫那样倾情地(甚至有些肉麻)挚爱上帝,已经不是时代的潮流,也不是狄尔泰的选择。狄尔泰反复追问精神科学的客观知识如何可能,这种追问本身表明了狄尔泰的科学素养和理性要求,这需要冷静的分析而不是躁动的激情。德罗伊森就曾明确指明:“历史学是经验科学,它研究的材料是目前还运行的事,以及

有关从前事的存留记载。历史学有其精确的要求。”^[15](P32)

德国的历史主义历史学家很少有德罗伊森与狄尔泰这样的思辨水平,他们秉承着一个十分素朴的常识:生命无非就是个体或个人,历史叙述或理解的对象正是个体或个人。因为生命总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单称状态的个体存在,而单称存在则意味着个体性。西美尔说:“规律只能理解认识对象的一般属性。……可是,历史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关心个体,关注绝对独一无二的人物。”^[14](P44)历史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崇拜个性,这可以上溯到笛卡尔主义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

如果说18世纪人们的世界观是由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哲学家塑造的,那么19世纪德国的公众舆论就是由历史学家来制造的。历史学家不仅是大学的教授,他们还是最活跃的政治评论家、现代政治党派的创始人、国家议会的议员、君主的资深顾问乃至政府首脑。与浪漫主义讴歌诗人、艺术家的天才不同,德国历史主义则对现实历史中的强权人物顶礼膜拜。

兰克曾动情地说:“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15](P9)为了彰显强势人物,兰克可以连自我都忘却,这就是兰克的强权英雄历史观的露骨表达。谁是欧洲现实世界中的强势人物?教皇与君主。在启蒙主义思想席卷欧洲的浪潮中,兰克献上了一部《教皇史》。他的辩解辞是:“我们把教皇视为世界历史、人类普遍进步的一部分。”^[3](P90)在启蒙者的视野中,兰克的回答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仅如此,在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的前夜,兰克出版了3卷本的《普鲁士史》来为普鲁士的强权摇旗呐喊。当1848年革命浪潮正式席卷整个欧洲时,兰克力劝普鲁士国王要强硬压制自由主义的法兰克福议会。1877年,老年兰克在日记中写道:“近代历史学家处于君主制之下,这是相当幸运的事情。因为在君主制之下,没有人会限制他的才能。……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君主制,因为君主制为文化生活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生活,独立地在世界事务当中有所作为。”^[3](P351)正因如此,兰克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皇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普鲁士君主强权专制制度忠诚而出色的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他写的一切都是他的思想偏见和利益的反映^[16](P295)。

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民族国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体,它不过是一个放大的个人。古代柏拉图也是这么类比的。但是,德国历史主义主张,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可以牺牲个人。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恺撒主义大行其道。从个人崇拜到民族国家的礼赞,德国历史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跃。在1849年的宪法冲突中,特赖奇克(狄尔泰的柏林大学同事)严厉抨击俾斯麦的专制,可是民主宪政无望后,到了1866年,他摇身一变则成了铁血政策的代言人和俾斯麦的歌颂者。特赖奇克把侵占德国的法国皇帝拿破仑视为一个伟大的蠢材、邪恶的怪物,他批评社会主义者只懂得吞噬法国厨房的残羹剩饭,他渴望伟大人物来拯救德意志民族的危难,他高呼犹太人是德国不幸的根源,他嘲讽英国人是“浅薄的功利主义者,狭隘自私的岛民,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鸦片烟枪在世界上传播文明之福利的伪善者”^[17](P224)。

强权人物崇拜,民族狂热,所有这些都让狄尔泰觉得特别刺耳。他想要科学地分析欧洲民主革命的发生与民族国家的独立。狄尔泰指出:“现代民族都是从偶然的政治结构走向统一的国家。……宗教是分裂的根源。在启蒙运动时期,没有人曾经意识到,普鲁士肩负着德国政治统一的使命。这标志着该时期政治情况的特殊性。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还是在与奥地利和法国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出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1](P306)在狄尔泰看来,过往的宗教狂热是危险的,因为它制造战争与分裂;现在的民族狂热也是危险的,他会为新生的德国埋下祸根。狄尔泰下定义说:“我们所说的民族指的是一个由多种部分组成的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合体。”^[1](P256)这个定义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喧嚣声中,它至少带来了几分冷静与理性。

狄尔泰是矛盾的。如果追随浪漫主义的天才崇拜,那么有可能陷入神秘的、不可言说的非理性主义而不能自拔。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实证主义的科学道路走下去,那又会淹没掉生命的神圣与尊严。如果走反启蒙主义的历史主义道路,强权英雄的癫狂又随时都有可能毁灭一切。奥地利诗人格蕾尔帕泽尔

有一个近乎先知式的历史诊断：“人性——民族性——兽性。”^[18](P69)从早期浪漫主义礼赞人性，中间经历历史主义的民族狂热，最后到达的就是纳粹主义的兽性。这样一来，狄尔泰的思想既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但同时又是它的对立面启蒙主义—实证主义的。这是一种尖锐的矛盾。如何解决？狄尔泰说：“对于异域以及过去事务的再创造、再体验清楚地表明，理解基于一种特殊的、个体性的天才。但是理解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一项重要、持久的任务。”^[1](P198)当狄尔泰把理解视为历史学的基础时，他就开始逐渐靠近黑格尔的思辨张力了。

三、客观精神与新黑格尔主义转向

作为德国文坛的常青树和知人识人的伯乐，歌德的远见卓识不同凡响。他在《浮士德》中有句至理名言：“尽管蔑视理智，蔑视科学，蔑视人间最高贵的才能——这样你就委身于恶魔，结果必致沦丧。”^[19](P6)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来批判德国早已存在的浪漫主义。他嘲讽浪漫派的文学创造只是一些思维混乱的拼凑物，既不是鱼也不是肉，既不是诗也不是哲学，而只是一堆淡而无味的散文甚至狂言呓语。黑格尔明确主张用概念(理性本身)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科学性来取代浪漫主义含糊不清的直观和混乱奔流的情感。“灵感虽闪烁着这样的光芒，也还没照亮最崇高的穹苍。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Arbeit des Begriffs)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Allgemeinheit des Wissens)。”^[20](P65)在黑格尔看来，只有通过理性的概念运作，思维才能产生出知识的整体(系统)来。一种哲学如果没有系统，那会是凌乱不堪的乱麻。

1883年狄尔泰出版了他著名的《精神科学导论》，书中一开篇就说他计划要把历史的探讨与系统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便找到精神科学富有确定性的哲学基础^[8](P3)。显然，在哲学中能把历史和系统这二者结合起来的最佳典范非黑格尔莫属。恩格斯称赞黑格尔哲学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他的《哲学全书》是百科全书式的恢宏体系。尽管这个时期狄尔泰的思想还是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占上风，但是他的这个哲学要求本身已经内在隐含着走向黑格尔的诸多因素了。

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时间里，当新康德派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从哲学内部、艾宾浩斯从实验心理学外部向狄尔泰发起论战以来，狄尔泰加速了脱离新康德主义而向新黑格尔主义转向的进程。李凯尔特认为，狄尔泰对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是根本错误的，尤其是他自创的“描述心理学”不可能是科学。心理学采用的是普遍化的实验方法，而历史采用的是个别化的方法，因此心理学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实证科学)，而不应该归入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李凯尔特尖锐地批判狄尔泰说：“纯粹的体验并不是科学，也不能给予它一个普遍化的形式，以达到历史认识的目的。”^[21](P65)这些批评深深触动了狄尔泰。

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狄尔泰终于在1906年出版了新著《青年黑格尔》，以此系统考察黑格尔早期的神学思想。他似乎想用宗教这个论题在青年黑格尔思想历程中的地位来拉近黑格尔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距离，进而调和启蒙主义(理性)与浪漫主义(生命)的矛盾对立。狄尔泰的这种思路开启了20世纪黑格尔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后来的卢卡奇、柯耶夫和法兰克福学派都从这里获益良多。这可以视为狄尔泰成为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第一个显著标志，第二个标志则是狄尔泰对黑格尔“客观精神”概念的创造性发展。国际狄尔泰研究专家穆尔也认为，狄尔泰以极富个性的方式将黑格尔当作灵感来源^[22](P260)。

狄尔泰已经意识到，历史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直观情感中，否则他就不能突破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死胡同。狄尔泰开始转变自己的论调说：“我的出发点是，历史的对象就是我们看到的生命的客观物的总体。”^[1](P222)狄尔泰借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客观精神”来更精炼地概括这个“生命的客观物的总体”。因此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就从早年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生命体验扩展到对客观精神广阔世界的普遍理解。这意味狄尔泰并没有放弃个人体验在历史学中的基础地位，而只是对它进行了一种客观化的扩充。

“我一直将生命客观物称作客观精神。黑格尔深刻而又幸运地创造出这一术语。”^[1](P131)狄尔泰

如是说。尽管也有批评,但是晚年狄尔泰对黑格尔的赞赏态度最引人注目。他说:“黑格尔是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天才之一。他将历史世界的各种伟大创造力集合进自己心灵的宁静深处。”^[1](P91)“黑格尔对于历史的天才贡献直到今天都被大大低估了。”^[1](P104)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狄尔泰身上,黑格尔思想与解释学开始了融合的进程。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当中,客观精神包含三个要素:法、道德和伦理。在伦理当中,又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部分。用黑格尔的思辨话语来表达,客观精神就是“作为一个必须由它(精神)来产生和已被它产生出来的世界”^[23](P32)。狄尔泰拓宽了客观精神的范围,他界定说:“我所谓的客观精神指的是一些纷繁复杂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诸个体物中的共同性将其自身客观化于感性世界之中。在这种客观精神中,过去物持久地存在于我们面前。它的领域包括生活方式、交往形式、社会为自己创立的目的系统。同时,它也包括道德、法律、政权、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1](P191)这样一来,客观精神几乎就成了人类一切身体表达、物质与精神的创造物总和,而这就是历史理解的对象。在客观精神中,历史不再是毁灭史,不再是赫拉克利特那永恒流变的河流,而是获得了感性的确定性与客观的普遍性。客观精神不是个人深不可测的生命体验,而是历史的客观物,它应该被看作是历史世界普遍有效知识的基础。兰克就曾说:“我们的任务仅仅只是研究和关注客观事实。”^[3](P211)

面对客观精神如此广阔的历史世界,我们的理解如何下手?狄尔泰回答:“只有将系统的精神科学运用于历史,我们才能理解历史。”^[1](P164)这就意味着要对客观精神进行逻辑化、概念化的分类处理和关系疏导。黑格尔明确主张:“哲学是以思想、范畴,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概念去代替表象。”^[24](P44)此时,狄尔泰似乎接受了黑格尔的这种概念理性的观点,他反复强调概念构造对理解历史的重要性。狄尔泰说:“系统精神科学的任务是,构造恰当的概念,从而表现生命的内在倾向、生命的变动不安,特别是生命的目的及其实现。历史的和系统的精神科学的任务还在于,用概念的方式确定这些关系。”^[1](P139)

狄尔泰用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教育、科学、经济、政治等区分出各种精神科学的子系统,并且表明所有这些子系统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每个子系统之间或子系统与整体之间都会产生一种效果关联(wirkungszusammenhang)。“我们可以将精神世界看作是一个效果关联体,或者是由该关联体的持久存在的产物构成的整体。”^[1](P135)这种效果关联区别于自然科学那样的机械因果必然联系,因为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联系是基于生命个体自发的交往冲动或激情,他们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一种超越片面的机械因果联系而呈现为错综复杂的互为因果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合力。有时候,狄尔泰把这个整体用文化(kultur)来进行标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凯尔特文化哲学的影响。因此,人们又把狄尔泰称为文化哲学家。

但是历史中的效果关联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深渊,而是可以客观把握的。为此,狄尔泰采纳了西方解释学古已有之的理解循环观。“只有将历史事件中的某个部分与事件的整体相联系,才可能完全理解该部分;反过来,对于该整体的普遍史考察要以对这个事件中的诸部份的理解为前提。”^[1](P135)除了这种部分与整体的认识论循环,狄尔泰还提到特殊与普遍的循环,即对特殊物的理解依赖于普遍知识,反过来普遍知识的获得要以特殊物的理解为前提。“历史世界是一个以其自身为中心的效果关联体。”^[1](P122)历史事件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也能形成一种解释学循环。至此,我们看到,狄尔泰把传统一般应用在文本阅读方面的解释学循环扩展到整个历史世界,并且通过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中心与边缘的细致区分进一步深化了理解的解释学循环。

这种循环之所以可能,正是莫基于前面所说的效果关联,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一种像物理学中那样的“力”(Kraft)的传递。狄尔泰多次使用到“力”这个语词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狄尔泰实证主义态度的又一个例证。柯林伍德认为,狄尔泰跟同时代人一样,向实证主义投降了^[25](P249)。其实这种“力”就是效果关联或影响力,效果关联超越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联系,成为狄尔泰历史解释学中的重要术语,后来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的概念。狄尔泰

坚信,通过对客观精神的理解可以不断扩大我们的客观知识。

四、历史规律、价值与目的

当狄尔泰不断强化历史世界中的客观精神、客观知识和普遍的解释学方法时,他透露出来的正是启蒙主义—实证主义的气息,而这与他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来源是互相矛盾的。这种两难的困境,狄尔泰本人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可以这样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贫乏化、僵化了历史生命的丰富本质,而历史领域中的系统概念工作的反对者们又使这种本质沉没在生命那幽深莫测的深渊之中。”^[1](P139)如果说在客观精神中狄尔泰靠近了黑格尔,那么当他涉及历史规律、价值或目的的解释时,他就马上表现出拒斥黑格尔、拒斥启蒙历史哲学的态度,而重新走上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路径。

启蒙主义的历史哲学主张历史中有不以个人主观意志情感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普遍的价值尺度和终极的目的。雅斯贝尔斯更进一步指出:“历史哲学在西方的根据在于基督教信仰。”^[26](P132)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这种基督教历史观的样板,他区分圣史与俗史,主张圣史有开端和终结,上帝是历史的真正策划者和唯一目的。洛维特说:“基督教的历史解释把目光对准了未来,未来是一个确定的目标和一种最终的实现在时间上的视域。”^[27](P189)这个未来显然就是上帝。

维柯虽然身处18世纪,但是他的历史观是一种神意的循环论。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反对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说,主张宗教是一切现实政权的基础。因此,维柯说自己遵从古埃及人的观念,把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首先是神的时代,对应神权统治;接着是英雄的时代,对应的是贵族政体;最后是人的时代,对应的是民主政体或专制政体^[28](P24)。各民族在复兴过程中经历各种人类制度的复归过程。因此维柯的历史观不是启蒙的而是浪漫的。

启蒙的历史观把历史把握为一个服从理性秩序的有规律的过程,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历史目的论,而不是神学目的论。黑格尔是典型代表,他以“自由”这个理念作为裁决一切历史高低优劣的普遍标准,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历史是从东方社会开始的,这里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专制君主;接下来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奴隶制是这个时代的基础;最后是现代日耳曼民族的时代,这时人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就是黑格尔著名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自由公式。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的萌芽、壮大和全面普及的过程,因此它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在这里,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被黑格尔以理性的眼光完全透视了:“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der Fortschritt im Bewußtsein der Freiheit),这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中加以认识的。”^[6](P32)

对神意主宰历史的观点,狄尔泰是坚决要剔除的。他认为奥古斯丁对历史规划的沉思是模糊不清的、毫无根据的幻想,让人们想起的只是那些自我折磨的殉道者,这样一来只会让历史堕入迷雾之中。然而狄尔泰的老师兰克是接受奥古斯丁的观点的,他说:“所有的历史中都有上帝在居住、生活。每一项行动都证明上帝的存在;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也在宣扬着上帝名字,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我认为是,历史的伟大连续性。”^[3](P324)兰克提供了一种上帝存在的历史学证明。虽然狄尔泰在这点上违背了兰克,但是在面对黑格尔极强的启蒙主义历史目的论时,则其立场又回到了兰克那边:

下列观点决定了我选择的道路:1价值概念产生于生命。2测度判断等的标准存在于一个民族和时代的相对的价值、意义和目的的概念之中。3我们的任务是,说明这些概念如何发展成某种绝对物。4即便是价值和规范这样的绝对物也都内在于历史意识之中。^[1](P263)

狄尔泰如是说。他的这4条观点对我们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方向意义。显然,狄尔泰是基于浪漫主义个体生命哲学的立场来理解整个历史的。任何思想如果一旦触碰到他这个底线,尤其是当黑格尔在世界历史中提出“理性的狡计”(die List der Vernunft)时,那么他就要毫不犹豫地加以批判。为了保证世界历史

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黑格尔主张理性会利用历史中个人的需要、兴趣、热情、个性、才能乃至牺牲他的生命,而理性隐藏在现实斗争的背后,因此理性从来不会受损,这就是理性的狡计或狡猾。“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通的事物来,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各个人是供牺牲(preisgegeben)的、被抛弃(aufgeopfert)的。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这种惩罚。”^[6](P49)

简言之,黑格尔的意思是历史的进步需要牺牲个体。狄尔泰对此极为不满,他批判黑格尔的“理性狡计说”是一种过时的形而上学残余,好像“这种个体除了自我牺牲以外,不具有其他的任何标志”^[8](P167)。个体生命是所有价值的生发源泉,自由、进步、发展等价值都要依赖于生命。“历史本身所创造出的各种价值,其有效性来自对于生命中各种关系的说明。责任就是这些价值之一。它基于一种契约,或者基于对每一人类个体的尊严和价值的承认。这些价值都是普遍有效的真理,因为它们为规范历史世界中的生活提供了可能。”^[1](P237)显然,在狄尔泰看来,任何超出个体生命之上的价值理念都是空洞的抽象,普遍价值是以承认个体的尊严为前提的,但是狄尔泰并不认可启蒙主义那种基于自然法基础上的普遍个人权利。席勒曾说:“以前所有的时代——它们本身并不知情也未有此打算——都努力在促成我们这个人性的世纪。”^[29](P178)狄尔泰没有了这个理想。

然而个体生命中的价值是多样的、丰富的,狄尔泰并没有明确表明哪一种价值是最根本的,而是笼统地主张:“生命实现了最高的善。”^[1](P214)然而这并没有说明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因为世界历史不是个人的自传,历史尽管由个体构成,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往往是超越个人主观愿望之上的。狄尔泰转而求教“意义”这个概念:“对于生命意义的直观成了历史理解的最高立足点之一。”^[1](P305)然而,意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它可以包含目的、价值、发展、理想等概念。显然,由于狄尔泰拒绝启蒙主义理性和自由这两个核心的普遍范畴,他没能产生超越一切民族和时代之上的普遍价值。文德尔班甚至公开宣称所有历史、价值都是个别的和相对的:“我们必须坚持: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所有与价值相关的评价,全都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的。……个人生命固然如此,整个历史过程也完全一样:它之所以有价值,仅仅在于它是一次性的。”^[30](P251)

历史相对主义似乎成了狄尔泰思想不可避免的宿命。为了对抗启蒙的普遍主义,狄尔泰甚至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适用于一切民族的价值。”^[1](P262)判断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标准就存在于这个民族和时代当中。这样一来,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之间就是不可比较、不可通约的,因为每一个民族和时代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相对价值。狄尔泰批评黑格尔说:“认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理性发展的一个阶段,这只是黑格尔的臆想。对于一个时代的描绘要以对于上述事实性的清楚认识为前提。”^[1](P260)狄尔泰在这里重复着兰克的老调,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相对主义的泥潭。尽管他说要把相对的价值和规范发展成为绝对物,可是这种绝对物又被他死死地囚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中,因此,狄尔泰所谓的绝对物除了神秘空洞的生命体验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普遍的价值标准了。

席勒有句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黑格尔对此加以发挥,以证明启蒙理性就是世界法庭的法官。兰克逆转黑格尔的判断,他主张:“历史是没有罪犯的法庭。”^[3](P342)一个没有罪犯的法庭是虚设的法庭,言外之意就是任何历史都没有罪过。这看起来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对一切历史都一视同仁,都要求普遍的同情理解。实质上,它毁灭了历史的正义,因为任何战争罪犯都可以援引历史的特殊权利来为自己开脱。狄尔泰自信没有走向相对主义,然而他太过乐观了,尤其是当不同民族发生矛盾冲突时,狄尔泰就失去了衡量的公正标尺。当世界历史中只有相对的价值时,那离价值的毁灭就不远了。安东尼指出:“历史主义试图理解过去,理解过去的制度、信仰和创造并为之辩护,这种努力使得历史主义走到了历史相对论和虚无主义的边缘,一切原则都可能在怀疑论中消解。”^[31](P12)

启蒙以理性的名义审查过去,它主张现代比过去更好更幸福,世界历史在进步和发展,自由是世界历史的目的。狄尔泰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它不能公正地再体验历史的自然能量。狄尔泰明确否认历史

中有所谓的客观进步,只承认世界历史有一种大概的潮流、趋势、倾向或发展,“我将这个受到生命过程的内在制约,同时也决定着无休止的变化过程的关联称为发展”^[1](P222)。显然,狄尔泰的这个发展观是含混不清的,他似乎把发展等同于变化。因为历史的变化可以有三种样态:第一是发展或进步,第二是停止不前,第三则是倒退堕落。兰克曾明确表示只有物质自然与技术应用领域有进步,在诗歌艺术、道德宗教或国家事务方面则无进步可言。例如,自从出现基督教以来,宗教就再也没出现过进步。

狄尔泰的思想是自我矛盾的,同一本著作在字面上找出很多前后对立的例子来:前面刚严厉批评黑格尔的启蒙主义进步观,后面的篇章中却对此表示赞扬说“我们不应该轻视那些借助于一系列概念,去认知各民族发展中的共同阶段的努力。从黑格尔开始,这些努力者中间最出色者在从依赖性到自由的自我决定的进步中,找到了发展的规则”^[1](P312)。所有这些矛盾印证了伽达默尔的判断:狄尔泰身上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与启蒙主义—实证主义产生了深刻而尖锐的对立,从而使他深陷无法调解的困境。

五、结 语

自黑格尔去世以后,德国乃至全世界再也没有产生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狄尔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了一次系统化的尝试,但是失败了。帕尔默把狄尔泰称为当代诠释学疑难问题之父^[32](P161),这个称谓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狄尔泰思想的复杂性。狄尔泰把传统浪漫主义对上帝的直观情感转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以此来对抗实证主义的技术化。他将兰克等人的历史主义作了一种哲学化的提炼,以此来批判黑格尔的启蒙历史观。但是,由于在本质上拒斥概念理性与形而上学,狄尔泰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体系,反而日益实证化和黑格尔化。在此意义上,狄尔泰的思想是19世纪各种思潮的一次大综合与大调和,同时也是向20世纪思想过渡的重要桥梁。

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为理论基石,把精神的一切客观物都视为历史的对象和理解的对象。然而精神的普遍历史化会带来什么困境?尼采的批判一语中的:“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33](P1)在过去的尘堆中寻寻觅觅,呼吸着发霉的空气,吞食历史的残渣,反而会让生命残损退化。这是一种恶性的历史狂热病。黑格尔早就发出警告说:“一个苍白的回忆(eine fahle Erinnerung)无力对抗当前的活泼和自由。”^[6](P17)因此,不应让过去的历史成为当代的掘墓人。通过对启蒙的批判,狄尔泰客观上在哲学中打开了历史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潘多拉盒子,这是他不曾想到的。

参考文献

- [1] 安延明,李河.狄尔泰文集:第3卷(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 伽达默尔.诠释学II.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 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4] Gadamer. *Hermeneutik I(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6.
- [5]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6] *Hegel Werke 12*.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6.
- [7] 马克瑞尔.狄尔泰传——精神科学的哲学家.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8] 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9] 李永刚.历史主义与解释学——以“历史性”概念为核心的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0] 韩震,孟鸣岐.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 [11]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12] 施莱尔马赫.论宗教.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3]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4] 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陈志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5] 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6]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十八及十九世纪·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7] 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8] 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0] *Hegel Werke 3*.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6.
- [21] 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2] 穆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吕和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 [23] *Hegel Werke 10*.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6.
- [24] *Hegel Werke 8*.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6.
- [25]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6] 卡尔·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7] 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28]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9] 刘小枫.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谭立铸、王师、蒋开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 [30] 伯恩斯、皮卡德.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张羽佳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9.
- [31] 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 [32] 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33]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Dilthey's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and Its Dilemma

Huang Xiaozhou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 Dilthey has created a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Th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reasoning is a criticism of ability with which human beings know themselves,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Life is the foundation of Dilthey's philosophy. Everyone is an individual and every national state is an individual too. Dilthey's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extends from its early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ism of life experience to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of objective spirit. Dilthey was close to Hegel in the idea of objective spirit, but he would show an opposing attitude towards Hegel and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philosophy, going on his own way of romanticism and historicism again when he explained the historical law, value and aim. Therefore, Dilthey was trapped into the unresolved dilemma which came from the incisive contradictory between romanticism-historicism and enlightenment-positivism.

Key words Dilthey; historical reasoning; hermeneutics; objective spirit

■ 收稿日期 2021-03-22

■ 作者简介 黄小洲,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广西 南宁 530004。

■ 责任编辑 涂文迁